

## 严复《与严修书》日期考订辨讹

孙 青

严复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入学部为名词审定馆总纂，凡三年。期间与该部左侍郎严修（范孙）有书信往还<sup>1</sup>。仅据其日记所载，即有宣统元年己酉（1909）四月廿三（6月10日）“作缄与范孙侍郎”，及同年十二月廿二日（1910年2月1日）“古勒义来。动笔作书，与范老、骏人”两次<sup>2</sup>。

然两人之间的信函存世不多，经整理出版所见者，惟中华书局版《严复集》所收之一通。根据《严复集》的记载，这封信是由天津历史研究所的卞慧新先生抄寄的。卞慧新说一九五七、五八年间，有书店把黏本《范孙先生存札》拿到天津史编纂室去，当时室中主事的人不肯收，他就根据原件抄录了下来<sup>3</sup>。此信信尾仅署日期“廿三”，未标年月。王栻根据严复在宣统元年四月廿三日的日记中有“作缄与范孙侍郎”语，订其成期为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廿三（6月10日）。并给此信加了标题《与严修书》，及作了题注，收入《严复集》的第三册。同时，在第五册内《严复日记》之宣统元年四月廿三日条“作缄与范孙侍郎”语下作注，曰：“范孙侍郎，指学部左侍郎严修。直隶天津人。参见《与严修书》题解”。至此，考此信年月为1910年6月10日，即农历宣统己酉四月廿三日似成定案。

此后，孙应祥作《严复年谱》，在谱主“1909年（清宣统元年己酉）五十七岁”之“6月10日（四月二十三）”条下，载其“‘作缄与范孙（注三）侍郎’。（《己酉日记》）”并将此信的内容补入1909年6月10日条下<sup>4</sup>。

---

<sup>1</sup> 根据严复或严修日记所载，严复生前致严修书函并不止一封，然目前经整理出版面世者仅中华书局1986年版王栻主编之《严复集》第五册所收之一通。王栻加标题曰：《与严修书》。今从其例。王订此信成日为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廿三（6月10日），后之学者例从此说。参见：严复著，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三册第591-592页。

<sup>2</sup> 参见《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第1504页。

<sup>3</sup> “据天津历史研究所卞慧新先生抄寄，并附说明如下：‘此札录自原件。一九五七、五八年间，书肆以黏本《范孙先生存札》至天津史编纂室。主者不收，因择录其文。’”，参见《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sup>4</sup> “1909年（清宣统元年己酉）五十七岁 6月10日（四月二十三） ‘作缄与范孙侍郎’。（《己

因此，关于严复与严修之间这封目前所见唯一之存世信函的日期，学界并无异议。然细察此信内容，涉及清末学部为完成九年预备立宪之分派任务，编纂部编本立宪国民教科书《国民必读课本》，并请严复参与修改等等情形。而学部在宣统元年四月间尚无修改此课本草稿的举动。严复受邀修改，当在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10月5日）管部大臣张之洞死后。因此若如王栻所考，此信年月为宣统元年四月廿三（1909年6月10日），则事多抵触，难以索解。今就此信所涉及的几个关键事项，细考其成期于下。

严复《与严修书》原信内容如下：

范老宗兄侍郎执事：

复于十九日始病脰风，颇重，于《国民必读》一事极著急。昨日晤朗溪，始悉公有复坟之请。病中默念，《大易》明夷于飞垂其翼之言，为抚枕叹息久之。极欲造宅一拜为别，顾贱恙医言最易感寒，今日幸托荫少愈，特起作数行呈公，以寄无穷之感想，公<当>深察此诚也。复即病愈，年内当不能南。至《国民必读》后卷，幸已了六七，极愿力疾起草，但为医所切戒，只得属馆中能者分了此稿。复所草者，除《电学》一篇，因物理已成五篇，若此篇不勉完，则不配色。恐万不能别有附益矣。病来无时，非敢诤也，知关廛念，并此布闻。即叩 珂安 不具。 小弟复谨上 廿三<sup>5</sup>

### 1、关键词“廿三”：严复与严修之间通信的日期

如前所述，宣统元年即公历1909至1910年间，严复与严修之间的通信，仅据日记明确所载就有两次。一次是在宣统元年四月廿三日（公历1909年6月10日），也就是王栻订《与严修书》的成期。另一次是在宣统元年十二月廿二日，即公历1910年2月1日。严复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古勒义来。动笔作书，与范老、骏尺”。其中“范老”即指严修（范孙）。

除了严复以外，严修也有习惯在每天的日记中记录当日收信发信的简单情况。他在宣统己酉

---

酉日记》 函告：‘病脰风，颇重，于《国民必读》（指部编《国民必读课本》）一事极著急’。“复即病愈，年内当不能南。至《国民必读》后卷，幸已了六七，极愿力疾起草，但为医所切戒，只得嘱馆中能者分了此稿。复所草者，除《电学》一篇（因物理已成五篇，若此篇不勉完，则不配色），恐万不能别有附益矣。病来无时，非敢诤也。”（《严复集》第三册，第591页）”参见：孙应祥著：《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sup>5</sup> 参见《严复集》，第三册第591页。

（1909）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日收到“几道”的信。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又记录了“七钟前起 写信……几道……”<sup>6</sup>，显然是对严复此前之信的回复。

由此可知，宣统元年四月与十二月的这两通信都写在廿二、廿三日左右，由于原信末尾署的日期是“廿三”，王栻当是根据这一点判断此信成于农历四月而不是十二月。而严复与严修两人没有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信的内容，因此仅据日记，实际上是无法判断现在所看到的《与严修书》是写于哪一月的。而信末这个“廿三”实际上既有可能是农历四月，也有可能是农历十二月。

## 2、关键词：“复坟之请”：严修告假修墓返乡的时间与缘由

严复在《与严修书》中提到从朗溪（即时任学部左参议的福建侯官人林灏深）处“始悉公有复坟之请”，得知严修要告假回家修墓，并“极欲造宅一拜为别”。

根据严修自订年谱所载，他在宣统元年五十岁上，发生了几件事情：“在京供职。派充考试留学生阅卷大臣。张文襄公薨于位。冬十一月，奉派赴东陵。游盘山第四次。十二月，请假修墓。回津度岁”<sup>7</sup>。

因此严修“请假修墓”，事在张之洞死后的宣统元年十二月。根据后来更加详细的《严修先生年谱》所载，严修于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1910年1月29日）“递请假修墓折”，他先对学部尚书，即当初请他出山的荣庆交待这件事情，荣庆“颇谅余苦衷，亦未坚阻”，于是他就在“当夜委人入内呈递”。第二天，即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日（1910年1月30日）清廷批准了严修的告假，并命内阁学士李家驹署学部左侍郎<sup>8</sup>。

严修此次所谓“请假修墓”实际上便是辞去学部左侍郎的职务而退出政坛了。严修此次辞职之后，再未出仕。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屡次请他出任度支大臣、南北议和大臣、参政员议长等要职，而他“终不一就”<sup>9</sup>。因此，《与严修书》中所提到的这次“复坟之请”，实际上恰如陈宝泉所

<sup>6</sup> 参见严修著，《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三），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页下，第1562页下。

<sup>7</sup> 严修：《范孙自订年谱》见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先生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1月版，第9页。

<sup>8</sup> “十二月十九日（1月29日）‘递请假修墓折。先与荣尚书谈，荣颇谅余苦衷，亦未坚阻，遂于当夜委人入内呈递。’（据《日记》）。”“十二月二十日（1月30日）得准假，上命内阁学士李家驹署学部左侍郎。”参见，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年谱辑注》，见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先生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1月版，第238页

<sup>9</sup> “辛亥武昌起义，袁世凯再起，总理内阁，以朝旨召为度支大臣，力辞之。复派充南北议和大臣，婉却之。民国三年（1914），征为参政员议长，终不一就”，参见 谢巍：《严修年谱辑注·弁言》，王承礼辑

言“盖先生之政界生涯于此终矣”<sup>10</sup>。

严修于此时辞去学部要职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主要是与 1908 年两宫薨、张之洞逝世、摄政王载沣当国、袁世凯被免职，严修自己受排挤等事联系在一起的。

1908 年冬天，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大丧，光绪的弟弟载沣为摄政王。他“素恶袁世凯”将袁免职。严修认为袁世凯有智识，上疏要求留其外务尚书任，却“疏入不报”。袁氏离京，严修又与杨度等往车站送别。此举大概惹恼了摄政王，于是趁严修带领廷试游学学生引见，借题发挥，说他礼仪生疏，“奏对错误”，下旨交部察议，最后罚俸半年。等到 1909 年八月，张之洞去世后，严修更加觉得“确见天下事决无可为”、“事多掣肘，遂有去志。十二月请假修墓”<sup>11</sup>。

由于严修的“复坟之请”背后有上述种种情由，因此才会有学部尚书荣庆“颇谅余苦衷，亦未坚阻”的情况。而严复才会在信中强调“极欲造宅一别”，因为“此别”实际上为的是严修离部了。

《与严修书》既然提到“昨日”“始悉公有复坟之请”，而严修的萌生去意又是发生在张之洞 1909 年 10 月 5 日去世之后的事情，严修在 1910 年 1 月 29 日才呈递了修墓奏折，1 月 30 日得到批准。严复绝对不会在王栻说的 1909 年 6 月 10 日即明确提及此事，并说要去作别，因此此信不可能写于 1909 年 6 月 10 日，即宣统元年四月廿三，就很清楚了。

并且，配合日期来看，如果《与严修书》所署的“廿三”是宣统元年十二月廿三，即 1910 年 2 月 2 日的话，那么信中提到“昨日，始悉公有复坟之请”，即严复知道了严修 1 月 30 日修墓奏折得到批准的事情，就十分顺理成章了。

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年谱辑注》，见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先生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 年 1 月版，第 10 页。

<sup>10</sup> 陈宝泉：《严先生事略》（民国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在追悼会报告），《退思斋文存》，第 205 页。

<sup>11</sup> “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两宫大丧，载沣为摄政王，罢斥袁世凯。先生为惜异才，疏请留袁氏外务尚书任，疏入不报。袁氏离京，人皆畏祸，先生不惧留言，偕杨度等往车站送别，不以其人荣瘁异致，故袁氏始终德之。”“宣统元年（1909），……载沣素恶袁世凯，借先生带领廷试有学生引见之题，谓礼仪生疏，“奏对错误”，下旨交部察议，终罚俸半年。八月，张之洞去世后，为事多掣肘，遂有去志。十二月请假修墓。”参见谢巍：《严修年谱辑注·弁言》，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年谱辑注》，见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先生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 年 1 月版，第 9 页，第 10 页。“德宗逝世，摄政王当国，教育益不理。赖张文襄公（时为管学大臣）左右之，始勉强自安。逮文襄逝世，公确见天下事决无可为，遂谢病辞职。盖先生之政界生涯于此终矣。”，参见陈宝泉：《严先生事略》（民国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在追悼会报告），《退思斋文存》，第 205 页。“岁戊申，袁公以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被黜，公素知智略，缓急有足恃，奏请仍留原部，疏入不报。己酉，请假赴原籍慈溪扫墓；翌年，奏请开缺。”，参见高凌雯：《诰授光禄大夫学部左侍郎严公行状》，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年谱辑注》，见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王承礼辑注、张平宇参校：《严修先生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 年 1 月版，第 484 页。

### 3、关键词“脰风”：严复颈痛的时间

《与严修书》中还提到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严复在这段时间犯了严重的“脰风”：

复于十九日始病脰风，颇重。

此病看来令严复很受折磨，以至他虽然为严修的辞职“抚枕叹息久之”，却不能亲自去拜别，并且无法独力完成修订《国民必读课本》的任务。

察“脰”者，颈也<sup>12</sup>。“脰风”就是颈痛，也许是严重的落枕或者颈椎病。

对照严复日记来看，严复在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七日（1910年1月27日）开始记载自己“颈痛”，直到十二月廿二日（1910年2月1日）给严修写信“动笔作书，与范老”期间，这个病确实令他很困扰：

十二月十七日（1月27日）到馆。明恩溥与英毅兰来。严侍郎。颈右中寒，强痛。

十二月十八日（1月28日）到馆。问古勒义要药。次裳请，明日六点。

十二月十九日（1月29日）颈大痛。

十二月二十日（1月30日）颈大痛。得淡字信，伯玉、昭宸、佩三、郁斋、彪臣、致长等信。古勒义来。

十二月廿一日（1月31日）古勒义来。夜间极难睡。

十二月廿二日（2月1日）古勒义来。动笔作书，与范老、骏人<sup>13</sup>。

而考宣统元年四月廿三日（1910年6月10日）前后，严复仅在日记中记载自己有些腹痛，完全没有提到“颈痛”或“脰风”。因此，从《与严修书》提到“脰风”，并以此为理由向严修解释无法登门作别及独力完成修订《国民必读课本》的情况，基本上可以断定《与严修书》应该不是写于王栻所称之宣统元年四月廿三（1909年6月10日），而是作于同年十二月廿三日（1910年2月2日）。

<sup>12</sup> “脰：dòu《唐韵》徒候切。《集韵》《韵会》《正韵》大透切。并音豆。《说文》：项也。《玉篇》：颈也。《博雅》：脰，项也。《左传·襄十八年》两矢夹脰。注：脰，颈也。《史记·田单传》：自奋绝脰而死。注：脰，颈。齐语也。”参见《康熙字典 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8月，第951页。

<sup>13</sup> 参见《严复集》，第五册，第1504页。

## 4、关键词“《国民必读》”：严复完成修订《国民必读》的时间

1908年8月，清廷颁《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分派学部编纂《国民必读》课本，作为培养立宪国民及日后开国会行立宪的基础。学部将这个任务交给本部编译图书局分管，集坊间各本详加比照，曾拟定宗旨草出一些底本。却直到1909年10月管部大臣张之洞逝世之前，都没有得到他的首肯，因此一直没有真正成书。张之洞死后，尚书荣庆，左右侍郎严修、宝熙请名词修订馆总纂严复来进行修订，不过后来严复所修订的本子似乎最终并未被采用，这是后话，与本文主旨无涉，此不赘述。

根据严复日记所记载，他从宣统元年十月三十日（1909年12月12日）与朋友评论《国民必读》开始，十一月初五日（1909年12月17日）同严修、宝熙商量课本，十一月初九日（1909年12月21日）受托修改。一直到十一月廿四日（1910年1月5日）完成第二集上卷，十二月廿四日（1910年2月3日）“了物理五篇”，十二月廿六日（1910年2月5日）“缴《国民必读》卷，到部”，此后在日记再也未见记载与此课本相关的事情。其间于十二月廿二日（1910年2月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写信给严修。

十月三十日(12月12日) ……王书衡来。评《国民必读》。白振民，伍崇学，胡玉缙。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7日) 到馆。到部，见严、宝两侍郎，言《国民必读》事。菊生寄到地图。

十一月初七日(12月19日) 五钟请客。看陈曾寿、潘清荫所编《国民必读》。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1日) 严、宝两侍郎以《国民必读》相托。

十一月十二日(12月24日) 会议《国民必读》事。得菊生缄。

十一月十五日(12月27日) 到馆，理《国民必读》。……

十一月十九日(12月31日) 本日大风。未到馆。……在家改《国民必读》，闷损已极。

十一月廿四日(1月5日) 到馆。《国民必读》第二集上卷完。……

十一月廿七日(1月8日) 到馆，交《国民必读》七本。……

十二月初三日(1月13日) 雪愈大。到馆，改《国民必读》第四卷。…… 十二月十四日(1月24日) 到馆。到部。交《国民必读》与朗溪。……

十二月廿二日(2月1日) 古勒义来。动笔作书，与范老、骏人。

十二月廿四日(2月3日) 了《物理》五篇。

十二月廿六日(2月5日) 缴《国民必读》卷，到部。……<sup>14</sup>

<sup>14</sup> 同上。

根据严复日记记载他修订学部《国民必读》课本的前后经过，很明显可以看到，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6月）的时候张之洞还在世，严复也远未“受托”修改课本，因此不可能有《与严修书》信中提到的完成了该课本后卷的大部分，并已经完成《物理》五篇这样的情况。不会有“至《国民必读》后卷，幸已了六七”及“复所草者，除《电学》一篇，因物理已成五篇，若此篇不勉完，则不配色”这样的话。

严复日记中提到动笔作书与“范老”是在十二月廿二日，而记载“了《物理》五篇”是在宣统元年十二月廿四日，虽然都不是《与严修书》所署的“廿三”。但是，考“动笔”虽在廿二日，而完成寄出极有可能在第二天的廿三日，而日记又常有补记的情况，所以，《与严修书》所署的“廿三”一则绝无可能是王氏所订，学界向所沿袭的日期，即宣统元年四月廿三（公元1909年6月10日），二则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宣统元年十二月廿三（公元1910年2月2日）。

### 小 结

综合上述严复及严修各自日记中所记载的收寄信函情况，及《与严修书》中提到的严修“复坟之请”即其请假修墓的时间与缘由，并考严复患“脰风”及修订学部《国民必读》课本，完成其中《物理》五篇的时间等等情况，可以大致断定，严复与严修之间目前所见的唯一存世信函《与严修书》应该不是写在宣统元年四月廿三，即公元1909年6月10日，而是写在十二月廿三，即公元1910年2月2日。这样的话，原信中所提到的一系列重要事情就不致互相抵触而使学者费解了。

附注：本文是笔者在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进修期间与沈国威教授进行的共同研究“清末国民必读课本研究”的部分成果。

## 『或問』投稿規定

- 投稿資格は、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会員（入会は内田、又は沈まで）。
- 投稿論文は、原則として未公開の完全原稿とし、電子テキストとプリントアウトの両方を提出する。原稿は返却しない。
- 執筆者による校正は、二校までとする。
- 投稿論文は、本誌掲載後、他の論文集等の出版物への投稿を妨げない。
- 原稿作成に当たって、『或問』「執筆要領」を厳守する。
- 原稿料は支払わないが、雑誌を格安価格で提供する。

## 『或問』執筆要領

1. 使用言語は、日本語、英語、中国語とする。
2. 字数は、16,000字（400字詰め原稿用紙40枚）までとする。
3. 簡単な要旨（原稿と異なる言語による）を付する。
4. 投稿は、所定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用い、表などは極力避ける。フォーマットは、沈国威までご連絡ください。
5. テンプレートを使用しない場合、テキストファイルの形で提出する。
6. 論文中に中国語などを混在させる場合、Windowsは、微軟PINYIN2.0（簡体字）、微軟新注音（繁体字）を用いること。
7. 注は、文末注を用い、文章の行中に（注1）のように番号を付ける。
8. 参考文献は、下記の体裁で文末注の後に付ける。

（単行本）

或問太郎 『西学東漸の研究』、大阪：しずみ書房、2000年10-20頁

Bennett, Adrian A.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論文）

或問花子 「東学西漸の研究」、『或問』第1号、2000年2-15頁

Fryer, John.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pp. 531-549.

9. 本文や注の中で、文献に言及するときには、或問太郎（2000:2-15）のように指示する。同一著者による同年の論著は、2000a、2000bのように区別する。

内田慶市 (keiuchid@pp.iij4u.or.jp)

沈 国威 (shkky@kansai-u.ac.jp)